

乡愁

南有嘉木 岁岁重阳

武文 文/摄

“人生易老天难老，岁岁重阳”，这词道尽了时光流转与自然恒久的辩证关系。除了佳节，“重阳”亦是一种树的名字。它不如松柏常见，却往往与古老的村落、绵长的宗族持久相伴，成为一方水土的见证者。我所见的两棵重阳木，便是如此。

海曙区古林镇闻江岸自然村有一棵重阳木。闻江岸，以明代刑部尚书、吏部尚书闻渊而出名。村内小河边的那棵重阳木，已有几百年历史，见证了一代又一代少年的快乐时光，曾有很多孩童爬到树上玩耍，还有人站在树杈上，把它当作跳水平台。如今重阳木看似老了，树皮开裂，满身沧桑，但枝头悄然萌生的鹅黄新叶，却在无声地宣告着内在的蓬勃生机。

闻江岸村子不大，古建筑多集中在河道的北侧。沿河的位置叫前侧角，周边分布着四座古建筑，其中一座叫“春源”，气势恢宏，保存完好。老宅里至今仍张贴着一些中榜喜报，似乎言说着这户人家曾经的辉煌。另一座建筑的门头上有“远山近水”“山灵水秀”等字样，石窗等石雕构件非常精美。

离重阳木不远处，有闻家祠堂，如今是区级文保单位，门联上写有“益都旧族”“甬水名宗”等字样。我在旁边转悠时，刚好有一个老人来开门。询问之后，老人陪我参观并为我作了介绍。这文闻氏的堂号为追远堂，始祖是从鄞江响岩山迁入石马塘闻江岸的。追远堂以“继世收成，宏曰昭庭；端方恭友，智勇廉贞；安和启泰，英烈传声；今嗣克振，祖德永明”32个字来排行命名，这也是闻氏的家训。祠堂天井里两个黄色的大水缸是旧物，老人说原来有四个，上面刻有“闻氏”字样，还有松竹等图案，是在宜兴定制的，有200多年的历史了。这个祠堂的特别之处是西侧有女祠，推开一扇小木门就是。女祠为研究封建时代的男女平等提供了实物依据。

闻江岸的重阳木，目睹了闻氏一族的过往。而在姜山的走马塘村，有一棵更为古老的重阳木，见证了时代兴衰和陈氏家族绵延千年的文脉。

这棵重阳木是村中当之无愧的树王，它屹立于蟹肚脐池塘边，通体布满青苔，虬枝怒张。因树身日渐庞大，重心渐渐向河中倾斜，村人使用石条顶着树身，下铺石板，不使其下沉。百年后，树慢慢地把石条包围了，于是形成了“树中生树，树石吻合”的奇观。它是一位沉默的史官，村中76位进士的荣光与寻常人家的悲欢，都一同被写进它苍老的年轮里。

走马塘村始建于北宋端拱元年（988年）。江苏长洲进士陈矜任明州知府，死后葬于茅山。其子为父守陵，选择了走马塘这块风水宝地定居，遂成为走马塘陈氏的先祖。此后陈氏子孙繁衍，耕读传家，渐成鄞南望族。走马塘历代出了76位进士，被誉为“中国进士第一村”。陈氏世代清廉，一门忠烈。如南宋陈大寅，乃开禧元年（1205年）的进士，在西河州为官时，遇蒙古兵攻城，陈大寅在援兵未到的情况下，带领士兵坚守城池，最后城陷而不降，与家人一同殉难。

重阳木多植于堤岸旁，冠如伞盖，春日里花叶同发，碎花淡绿，清雅可人。至秋日，则叶片转红，艳丽夺目。待到重阳时节，叶落果熟，纷飞的落叶似在向秋天致以最后的敬礼，而那褐红的浆果，则传达着关于长寿与繁衍的殷殷祈愿。

重阳木的树皮、树叶等皆可入药。种此一树，如有大夫。重阳木长寿，有“千年栢树，万年重阳”之说。它不仅以树姿点缀风景，以药性护卫安康，更以沉默的坚韧，阅尽人间春秋。岁岁重阳，今又重阳，人生易老，而嘉木长青。它们立于村头水畔，仿佛在询问着往来过客，何为短暂，何为恒常？



闻江岸村的重阳木



走马塘村重阳木旁的写生者

“通久源”轧花厂与南帮票号



旧时纱厂车间内景



严信厚

道老古

孙仰芳

清光绪十三年（1887年）三月，宁波北门外的湾头，一家近代轧花厂悄然诞生，它的主人叫严信厚，一个从钱庄业学徒一步步走来的传奇人物。这年，他联手新生泰洋布店老板汤仰高，出资五万两白银，从日本购买了蒸汽发动机和四十台新式轧花机，创办了“通久源”轧花厂。这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机器轧花厂，而清末“状元公”张謇脱下朝服，投身实业，在江苏南通创办大生纱厂则是在1895年，比阿拉宁波“通久源”轧花厂足足晚了八个年头！

初春时节，三江口码头桅樯林立，岸边围满了百姓，人们踮脚探头，目光齐齐锁在江中的一艘货船上，高声呼喊：“来了！来了！”

这艘货船上，载着一台台通体乌黑、沉甸甸的西洋机器。八个壮实力夫弯腰落力，将这些外洋运来的“巨无霸”抬到了江岸上。

当时的人们，见惯的是木制纺车、竹制弹花弓，听惯的是家家户户昼夜不息的机杼声，这般冰冷沉重的铁家伙，无异于天外异物。而严信厚深知，此时单靠传统手工已经无法与外国商品竞争。

在这之前的数月内，几里之外的湾头下江村北岸的空地上，西式砖楼拔地而起，错落的厂房依次排布，轧花间、晾干间、打包间，整个厂区沿江边铺开，绵延数百米。待机器搬运就位、安装妥当，一块黑漆木牌悄然挂上了厂区大门。木牌字迹端正厚重，上书三

字：通久源。

没有盛大的仪式，没有喧哗的庆贺，在1887年的初春，中国首家机器轧花厂破土新生。开工那日，厂区内外焕然一新，四十台日本产新式大踏板轧花机整齐地排列在车间之中。机器初次运转时，低沉的轰鸣声响起，齿轮咬合、机轴转动、蒸汽吞吐，沉闷的机器声取代了往日细碎的纺车声，震动了百年静谧的湾头乡野。工厂最初雇用了三四百名女工，还特意从日本请来了工程师和技师。严信厚没有简单照搬外国技术，而是巧妙地将传统工艺与现代机器结合，他要求女工们先掌握“三纱九锭”的传统技艺，再操作机器。这种中西合璧的策略，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，更让产品在市场上独树一帜。

1894年，严信厚又联合沪甬富商戴瑞卿等人集资45万两白银，对“通久源”轧花厂进行扩建，将其发展为“通久源”纺纱织布局，使轧花、纺纱、织布形成一条龙产业，极大地提高了与洋货的竞争力。这一扩建工程于1896年完工，扩建后的工厂，纱锭数量达到一万一千二百枚，织布机增加到四百台，工人数增至一千二百名，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纺织厂之一。上海的《北华捷报》曾这样描述“通久源”纺纱织布局：“一只大烟囱耸立在那里，和城市的宝塔一样惹人注目，强大的机器还在安装，前途充满希望，将成为与洋布为敌的有力竞争者。”

“通久源”轧花厂的资金，



源丰润票号的银票

大多来自严信厚在上海创办的源丰润票号（钱庄业前身）。他曾长期担任上海道库惠通官银号经理，掌管上海道的公款收支，财权在手。源丰润票号自诞生之初，便锚定了独特的业务格局，主营官府汇解银两，兼营南北商业汇兑，为其扩张筑牢了雄厚的资本根基。短短十余年，源丰润票号开启全国乃至海外布局，在北京、天津、汉口、广州、上海、宁波等国内各大经济重镇皆设分号，触角更延伸至新加坡等海外商贸枢纽。彼时，沪上金融界有“南帮双雄”之说，一是李鸿章家族旗下的义善源票号，二是严信厚的源丰润票号。两家票号并肩而立，稳居江南金融机构顶端，是清末最具实力的金融巨擘。

严信厚手握充盈的金融资本，并未囿于银钱周转的安逸营生，反而心怀实业救国之志，以金融之力滋养民族工业。1904年，严信厚又联手同行在纺纱厂的厂地上，建立了一家以蒸汽为动力的面粉厂，即“通久源”面粉厂，这是我国早期的机器面粉工业之一。1905年，张玉成等人集资在城区濠河街开办我市第一家机器榨油厂，严信厚积极参与与创办过程，并投入资金。因为榨油厂利用“通久源”轧花厂剩下的棉籽榨油，所以厂名叫“通久源”。此外，他还在慈城创办了浙江省第一家火柴厂，即“慈溪火柴厂”。当时，曾有老友劝说严信厚：“票号稳赚不赔，坐拥百万资本，安享富贵即可，何必冒险涉足实业？”他摇头坦言：“金融为血脉，实业为根基，无实业支撑，银钱流转皆是泡影。”像严信厚这样的先行者，看清了时代大势，手握票号资本，不逐官场虚名，不贪银钱安逸，反倒将资本尽数投入本土实业，值得后人赞叹。

由此，又联想到“状元公”张謇筹办大生纱厂之艰难，他原计划招商股60万两，捧着募捐册跑遍江南各地，换来的尽是冷笑与嘲弄。最窘迫时，他在街头挂牌卖字换钱，连几个铜板都收，全部加起来仅募得三四万两。直到1898年，张謇通过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刘坤一协调，领用湖北官纱局存沪未用的纱锭机作价25万两作为官股，形成“官商合办”并约定“按年取息，不问盈亏”的模式，大生纱厂在创建后的第三年，才正式大规模生产。这与严信厚创办实业，资金取于自家经营的源丰润票号，形成天壤之别。

金融业，确为实业界的“蓄水池”。

（照片由本文作者提供）

回味

又见炒毛麸

黄瑾瑶 文/摄

“快来看看我给你买了啥。”刚从市集回来的先生喊道。我从沙发上直起身子，懒懒地回了一声：“啥？”“炒毛麸。”我腾地一下就从沙发上弹了起来，盯着装在透明快餐盒里的炒毛麸。看上去灰扑扑的米粉，打开盖子，却有一股独特的香味直冲鼻端，也冲开了记忆的闸门。

那时，早稻收割后，外婆家的屋前屋后就会弥漫着一股若有若无的焦香，各家的厨房里还会传出铲子在锅中炒米的声音，孩子们知道那是要做炒毛麸了。宁波有一习俗，等早稻米上了场，出嫁的女儿要送上新米磨的炒毛麸，给母亲尝尝鲜。

炒毛麸与现今琳琅满目的零食不同，它的配料极其简单干净，以早稻米为主要原料，配以少许黑芝麻、黄豆、生姜干等，经翻炒、碾磨等工序制作而成。它质朴得犹如山野的小花，却是那个物资匮乏年代里孩子们心心念念的美食。

每当“双抢”（抢收早稻、抢种晚稻）结束，家中的孩子就会眼巴巴地等着了。看着母亲将新收的早稻米放在铁锅里翻炒，等到米色略黄时起锅，再单独翻炒黄豆、芝麻等作为辅料，讲究点的还要放些姜、陈皮。然后把家里的石磨洗得干干净净。早先，米和辅料都是在自家的石磨上碾磨，一般要磨上两三遍，磨得细细的才能入口。后来有了机器，孩子们会主动把家里炒熟的原料拿到轧米厂加工点去碾磨，伴随着轰隆隆的声音，香喷喷的炒毛麸就新鲜出炉了。孩子们的脸上笑开了花，那段时间的轧米厂一天到晚都氤氲着米香。

这时节的外婆家最为热闹，因为外婆生了五朵“金花”，我有四个阿姨，母亲是大姐。阿姨们一家一袋往外婆家送炒毛麸，它们在八仙桌上一溜儿排开，高高低低，胖胖瘦瘦，像一群回娘家的女儿，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。袋口一解开，焦香就争着往外跑，满堂都是新米的味道，中间还夹杂着黄豆和芝麻的香味。外婆坐在矮凳上笑眯眯地看着，也不急着收起来，因为我们这些围在桌边的孩子早已垂涎欲滴了。外婆从灶间拿来几把调羹，一人一把，让我们自己舀着吃。

调羹伸进袋子里，舀起满满一勺，细细的粉，入口是酥松、香脆的，带着新米的质感，不似面粉的绵软，微甜不齁，越嚼越有滋味。心急的我们，常常因为舀得太多而被呛得直咳嗽，粉从嘴巴里喷出来，惹来大人们一阵笑。外婆看了就说：“慢点吃，慢点吃，没人抢。”这时的我们，还化身为试味师，你尝一口二姨家的，我尝一口小姨家的。二姨家的颜色偏深，定是芝麻放得多。小姨家的颜色偏黄，应是加了黄豆，还带点陈皮的清苦，回甘绵长。几个孩子就这样围着桌子，你一勺我一勺，不亦乐乎。

之后，外婆会把炒毛麸存在火油箱里，放在柜子的上方，防止我们偷吃。其实我们爬上凳子，踮踮脚就能够到，外婆也就做做样子。母亲则把炒毛麸放在镏饭碗里，沉甸甸的，碗盖上有个小扣，扣得严严实实，炒毛麸即便放一个秋天也不会回潮。

暑假里午后最热的时候，我和小伙伴喜欢搬了桌椅到弄堂口乘凉，每人端着自家的炒毛麸，一人一碗，各有各的味道，你尝尝我家的，我尝尝你家的。风从弄堂里穿过来，带着丝丝凉意，炒毛麸的香就在空气里散开了。我们一边吃，一边比谁家放的糖多，谁家的粉磨得细，叽叽喳喳声盖过了树上的蝉鸣。

刚磨好的炒毛麸是酥松、干燥的，可时间放久后，再盛到碗里，吹过热气，没多久就回潮了。粉慢慢吸了水汽，结成一小块一小块的，舀起来不再是一勺蓬松的粉，而是一小团一小团的，吃到嘴里软趴趴的。可我们根本不管这些，照样一勺一勺往嘴里送，仿佛这就是珍馐美味。

等到开学季，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搬镏饭碗，打开盖子，里面只剩小半了。用调羹舀了盛在小碗里，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，细细的粉，淡淡的甜，一口下去，整个口腔都充斥着满足感。

时光荏苒，渐渐地，周边的稻田越来越少，早稻下来再也没人做炒毛麸了……

再次遇见，没承想炒毛麸已经成了商品。先生说，现今市集上的炒毛麸都是用快餐盒包装的，一盒一盒，封得严严实实，摆在摊头，按照分量标价，10元和20元都有。看来炒毛麸也与时俱进了。

我用调羹舀着吃，还是那个味，只是外婆、八仙桌和那条矮凳，都留在记忆里了。那时不懂，只觉得好吃。现在才明白，炒毛麸是孝心的载体，沉淀着最踏实的烟火气，藏着时光里最朴素的幸福，也是丰收季最暖心的开场白。



炒毛麸